

## 從高僧到大師：論憨山德清的嶗山生涯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研究員  
何孝榮

### 摘 要

憨山德清（1546-1623）是晚明佛教四大師之一，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德清何時成為佛教大師？有何佛學思想和實踐？本文認為，從嘉靖四十三年（1564）正式披剃，到萬曆三年（1575）二月到達五台山，是德清出家修行的初期階段。這一階段，他是一位佛法的學習者、南方行腳僧。從萬曆三年二月到達五台山，到萬曆十年三月離開，德清在五台山居住修行八年。其間，他成長為一名佛法造詣高深的高僧。

自萬曆十一年四月至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德清住錫嶗山，「教化十二年」。其修行教化主要有幾個方面：獲藏建寺，立足嶗山；修行證悟，禪、教兼通，尤致意於華嚴；講經說法，授徒傳戒，接待參訪；結緣宮廷，皈依太后，志復大報恩寺；交結王臣士庶，談佛論禪，傳播佛教；賑饑救窮，壓制羅教。萬曆十七年，德清遭到道士耿義蘭等人控告，爆發了跨度達七年的海印寺官司，他最後以「私創寺院」罪名謫戍雷州。德清得罪的真正原因，是他捲入了當時的宮廷鬥爭，尤其是爭護「國本」，力圖維護傳統禮法制度，捲入神宗與李太后的矛盾和衝突。

論文指出，晚明佛教大師群體是在明朝中期以來佛教極度衰微的背景下出現的，他們普遍以復興佛法為使命，擔負起挽救佛教危機的重任。晚明佛教諸大師是禪教兼通的高僧；提倡諸宗融合、三教合一；修建寺院，講經說法，關注佛教發展；交遊王臣士庶，關注民生社會。他們帶頭復興晚明佛教，引領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因此被後人尊為晚明佛教大師。德清住錫嶗山十二年，完成個人佛學證悟，禪教兼通，尤致意於華嚴；提倡禪教一致，強調淨土念佛，鼓吹三教合一等，佛學思想基本形成，引領中國佛教的前行方向；復興嶗山、北京等地佛教，嶗山佛教興起，成為「東海洋洋佛國」；為王臣士庶等信向，李太后成為其俗家弟子，在當時社會有很大影響。以往研究憨山德清者，涉及其嶗山生涯，皆言其最終寺毀人謫，是個失敗的案例。其實，嶗山佛教經由德清提倡和傳播，從幾乎的佛教荒漠變為「東海洋洋佛國」，是晚明佛教復興的典型範例。總之，德清隱居嶗山十二年間，具足晚明佛教大師的群體特徵，完成了從高僧到大師的轉變。

**關鍵詞：**憨山德清、晚明佛教、四大師、嶗山、海印寺

憨山德清（1546-1623）是晚明佛教四大師之一，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縱觀德清一生，其從佛教高僧成長為大師，實與嶗山生涯有關。萬曆前期，他住錫嶗山十二年，完成個人佛學證悟，禪教兼通，尤致意於華嚴；提倡禪教一致，強調淨土念佛，鼓吹三教合一等，佛學思想基本形成，引領中國佛教的前行方向；復興嶗山、北京等地佛教，嶗山佛教興起，成為「東海洋洋佛國」；為王臣士庶等信向，李太后成為其俗家弟子，在當時社會有很大影響。以往的相關研究多側重於德清佛學思想和曹溪改革，對他在嶗山期間的佛學修為僅個別涉及海印寺官司。本文全面考察德清在嶗山期間的佛學思想和實踐，總結晚明佛教大師的群體特徵，從而展示德清從高僧到大師的轉變。不當之處，請方家指正。

## 一、憨山德清的早年經歷

憨山德清，俗姓蔡，明朝南直隸全椒縣（今屬安徽）人。母夢觀音菩薩送子而有娠。德清幼時，因叔父死，孀母生子，「死去生來之疑，不能解於懷矣」，開始思索佛教的根本問題。後入社學讀書，接受啟蒙教育，且得以聽、誦佛經。因其母信佛敬僧，「遂發出家之志」<sup>1</sup>。嘉靖三十六年（1557），入南京大報恩寺，從住持僧西林永寧學法。永寧為擇師，先教以佛教諸經，後授「四書五經」及「時藝」（八股文）、詩文，「一時童子，推無過者」<sup>2</sup>。嘉靖四十三年，因禪僧雲谷法會之勸，德清「遂決志做出世事」，正式披剃出家。他隨無極守愚法師聽講《華嚴玄談》，從受具足戒，「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恍然了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他慕華嚴宗四祖清涼澄觀為人，「因自命其字曰澄印」。次年十月，法會建禪期於天界寺，德清預會，得「開示審實念佛公案」，「從此參究」<sup>3</sup>，初入禪門。

南京大報恩寺本為晉長干寺、宋天禧寺，明洪武年間列於國家五大寺。永樂年間，明成祖為所謂報答「皇考妣」即明太祖、馬皇后之恩（或說實為紀念其生母碩妃），重建該寺，「梵宇皆準大內式，中造九級琉璃塔，賜額大報恩寺」<sup>4</sup>，是永樂以後南京三大寺之一。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一場雷雨將大報恩寺塔殿、畫

<sup>1</sup>（明）釋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三十五年丙辰，CBETA, X73, no. 1456, p. 831, a20- c13。

<sup>2</sup>《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嘉靖四十一年壬戌，CBETA, X73, no. 1456, p. 832, a18。

<sup>3</sup>《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四十四年乙丑，CBETA, X73, no. 1456, p. 832, a23-c23。

<sup>4</sup>（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三十一〈聚寶山報恩寺〉，何孝榮點校，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廊焚毀無餘，「午時，大雨如傾盆。忽大雷自塔而下，火發於塔殿，不移時大殿焚。至申、酉時，則各殿畫廊一百四十餘間悉為煨燼」，昔日富麗輝煌的皇家寺院圯廢不堪，住持及各執事僧等多被下獄。德清挺身救護，並與寺僧雪浪洪恩「俱決興復之志」。但靠他們當時的名聲與資歷遠不能募集到足夠資金，於是相約「拌命修行，以待時可也」。這年冬天，德清又從守愚「聽《法華經》於天界寺」，結識北來的山西蒲州山陰王替僧妙峯福登，「相期結伴同遊」<sup>5</sup>。

隆慶六年(1572)，德清決定到苦寒的北方游方問道，提高自己的佛學造詣，修復大報恩寺。在北京，他謁摩訶忠法師，聽講《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及法華、唯識宗學，又請安法師為講解因明學說。他參遍融真圓、笑巖德寶二大師，真圓「唯直視之而已」，德寶「開示向上數語」。他與達官名士王世貞、汪道昆等交遊，談佛論儒。他短暫遊歷五台山、盤山。在五台山，德清見北台憨山「果奇秀，默取為號」。在盤山，他隨一隱修僧修行，初證境空。萬曆二年(1574)，德清與在京重逢的福登一起離京往五台山常住。路過蒲州時，山陰王留結冬。他校閱《肇論中吳集解》，對僧肇「物不遷」論有了透徹瞭解，「恍然了悟曰：信乎諸法本無去來也」，「於是去來生死之疑，從此冰釋」。福登聞之，稱其「有住山本錢矣」<sup>6</sup>。明人吳應賓將德清一生佛法精進概括為「得宗通之相四」，此悟「諸法本無去來」，為「得宗通之相一」<sup>7</sup>。他又向伏牛山法光禪師請益，法光「開示以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並教以如何治「禪病」。德清「深得其旨」，「始知有宗門作略」<sup>8</sup>。

萬曆三年二月，德清到達五台山，居北台修行。溪上有獨木橋，他每日坐立其上，初則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即聞，不動即不聞。一日，坐橋上，忽然忘身，則音聲寂然。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則朗然，自覓身心，了不可得」。他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從此，他感覺「內外湛然，無復音聲色相為障礙，從前疑會，當下頓消」<sup>9</sup>。

<sup>5</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嘉靖四十五年丙寅，CBETA, X73, no. 1456, p. 833, a1-b1。

<sup>6</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二年甲戌，CBETA, X73, no. 1456, p. 834, c12-22。

<sup>7</sup> (明)吳應賓：〈大明廬山五乳峰法雲禪寺前中興曹溪嗣法憨山大師塔銘有序〉，見《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五〈附錄〉，CBETA, X73, no. 1456, p. 847, b23-c1。

<sup>8</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二年甲戌，CBETA, X73, no. 1456, p. 834, c23-24。

<sup>9</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三年乙亥，CBETA, X73, no. 1456, p. 835, b15-24。

吳應賓稱此悟從「忘身」到「忘心」，為「得宗通之相二」<sup>10</sup>。此後，他多次證悟，「入此三昧純熟」<sup>11</sup>。

與此同時，德清交結官員士庶。平陽知府胡來貢（山東萊州人）聞德清名，與交遊請教。五台山塔院寺主僧大方被誣訟，德清為謁已陞任山西按察副使的胡來貢辯白。他應請為山西巡撫高文薦作詩，後因五台山林木被奸商砍伐，威脅國防及佛教焚修環境，德清報告胡來貢，經高文薦「具本題准，嚴加禁革，砍伐乃寢」<sup>12</sup>。萬曆八年，大學士張居正下令在全國清丈田畝，徵收賦稅。五台山「從來未入版籍」，享受免除賦稅特權。至此，地方官命五台山徵稅糧五百石，合山憂之。德清「具白當道，竟免清丈，未加升合，台山道場遂以全」<sup>13</sup>。

德清積極結緣皇室。神宗生母李太后「信佛甚殷，布施甚廣，京師人稱佛老娘娘」<sup>14</sup>。萬曆初年，她「以保國選僧誦經」，德清「列名」其中。萬曆五年春，德清決定刺血書寫《華嚴經》一部，李太后賜金紙以助。萬曆七年，李太后命修五台山塔院寺舍利寶塔，德清積極配合，「力調護，始終無恙」。萬曆九年，德清與福登籌備為各自血書《華嚴經》成而「建一圓滿道場，名無遮會」。適神宗「有旨祈皇嗣，遣官於武當」，李太后「遣官於五台，即於本寺（指塔院寺，引者注）」。神宗皇后王氏無子，神宗至此為寵妃鄭氏，李太后則為被神宗「私幸」的慈寧宮宮女王氏，分別求道、佛保佑其生育皇子。德清認為，「沙門所作一切佛事，無非為國祝釐，陰翊皇度。今祈皇儲，乃為國之本也，莫大於此者」，力主順承李太后旨意祈皇儲，將無遮法會「盡歸併於求儲一事」<sup>15</sup>。福登起初不同意，宮廷內使也不贊成。德清力爭，於是祈儲成為無遮法會主題。十月，祈儲法會舉行。次年春，德清開講《華嚴玄談》。法會聲勢浩大，「百日之內，常住上牌一千眾，十方雲集僧俗，每日不下萬眾」。三月，會罷，德清與福登結清錢糧，告別五台山，「一鉢飄然長往」<sup>16</sup>，福登往蘆芽山，德清先後到真定障石巖、

<sup>10</sup>（明）吳應賓：〈大明廬山五乳峰法雲禪寺前中興曹溪嗣法憨山大師塔銘有序〉，見《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五〈附錄〉，CBETA, X73, no. 1456, p. 847, c1-5。

<sup>11</sup>《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六年丙寅，CBETA, X73, no. 1456, p. 836, b16。

<sup>12</sup>（明）釋鎮澄編纂、（民國）釋印光續纂：《清涼山志》卷六〈名公外護·明高、胡二公禁砍伐傳〉，《中華大藏經續編（漢文部分）》本。

<sup>13</sup>《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八年庚辰，CBETA, X73, no. 1456, p. 837, a20-b2。

<sup>14</sup>（明）釋福徵：《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萬曆五年丁丑，河北虛雲印經功德藏，1994年。

<sup>15</sup>《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九年辛巳，CBETA, X73, no. 1456, p. 837, b4-13。

<sup>16</sup>《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年壬午，CBETA, X73, no. 1456, p. 837, c3-9。

京西中峯寺調養。八月，王氏生皇長子常洛，「計人生十月之期，灼然不爽」<sup>17</sup>，德清等因有所謂「祈嗣」功，而名聲大振。至萬曆十一年春，德清「蹈東海之上」，赴嶗山隱居，易號「憨山」<sup>18</sup>，開始了十二年的嶗山生涯。

縱觀德清的早年經歷，從嘉靖四十三年正式披剃，到萬曆三年二月到達五台山，是他出家修行的初期階段。這一階段，他初入佛門，接觸禪宗、華嚴宗、天台宗、淨土宗等，具備了一定的佛學基礎，是一位佛法的學習者、南方行腳僧。從萬曆三年二月到達五台山，到萬曆十年三月離開，德清在五台山居住修行八年。其間，他多次證悟，不僅有了「住山本錢」，而且更加深入地把握和領會了佛法，尤其是禪宗與華嚴宗。德清開始與皇室、官員士庶交往，關注佛教發展、社會民生，以出世人作入世事，也贏得了聲名。因此，五台山期間，德清「從一名佛法的學習者轉變成一個佛法的施教者，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南方行腳僧成長為一名佛法造詣高深的高僧」<sup>19</sup>。

## 二、憨山德清的嶗山生涯

嶗山，時作「勞山」，或作「牢山」，在山東萊州府膠州即墨縣（今青島市）東南海濱，位置偏僻，且佛教勢微。作為佛法造詣高深、名聞佛教內外的高僧，德清何以要從佛教聖地五台山來隱居「不具之區」嶗山？據德清自己說：第一，是五台山祈儲成功，其名聲大振，但也得罪了前來祈儲的宦官。原來該宦官「窺伺帝意，懼有不測，故以阿附為心，遂二心於聖母之命」<sup>20</sup>，不同意將規模盛大的無遮法會改為祈儲法會，與德清產生矛盾。所謂「以當日無遮道場太盛，為宮闈祈嗣得嗣之名太著，忤內使之言有聞於內，其事更大，其名更不可居。是以台山難返，他山難就，而遠蹈東海，避跡牢山也」<sup>21</sup>。第二，德清立志修復大報恩寺，嶗山較五台山離京城更為近便，有利於抓住時機。對此，德清說：「始予為本寺回祿，志在興復，故修行以約緣。然居台山八年，頗有機會。恐遠失時，故隱居東海。此本心也」<sup>22</sup>。第三，嶗山是《華嚴經》所載那羅延窟諸菩薩住處，德清「因慕之」。

<sup>17</sup> 《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萬曆十年壬午。

<sup>18</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一年癸未，CBETA, X73, no. 1456, p. 837, c15。

<sup>19</sup> 夏清瑕：《憨山大師佛學思想研究》，學林出版社，2007年，第57-58頁。

<sup>20</sup> 《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萬曆九年辛巳。

<sup>21</sup> 《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萬曆十一年癸未。

<sup>22</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一年癸未，CBETA, X73, no. 1456, p. 837, c16-18。

自萬曆十一年(1583)四月至二十三年二月，德清住錫嶗山，「教化十二年」。大體說來，其修行教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 第一，獲藏建寺，立足嶗山。

萬曆十一年四月八日，德清至嶗山，找到那羅延窟，但「不可居」。他「探山南之最深處，背負眾山，面吞大海，極為奇絕」，得傾圮不堪的道教太清宮，其中有觀音庵廢址，「初掩片席於樹下」。七閱月，得土人張大心居士「為誅茅結廬以居」<sup>23</sup>。

李太后為感謝德清祈嗣，派人尋訪，德清不願赴京受賞賜。李太后遂在西山建寺，命其往住，德清竟謝不就。聽說嶗山無房舍可居，李太后「即發三千金，仍遣前使送至，以修庵居」。但德清堅決不同意，改以三千金賑災（詳見後文）。萬曆十四年，明神宗命以新刻成《續入藏經》四十一函「並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十五部，散施天下名山<sup>24</sup>。在李太后主使下，嶗山、蘆芽山各獲賜一部。大藏經送到嶗山，「茅屋數椽」，「無可安頓」，撫按官只好命當地官員先找地方「供奉」。德清詣京謝恩，李太后「命合眷各出布施，修寺安供，請命名曰海印寺」<sup>25</sup>。這樣，由李太后帶領妃嬪等為德清興建一座寺院，賜名「海印寺」。

海印寺的修建，得到山東地方官員大力支持。時任山東巡按御史毛在「現宰官身，而作佛事，一彈指頃，頓令海印發光，須彌湧動，天人忻悅」。寺居深山，道路隔絕，「凡百運用，不無艱難，幸馬即墨力任持之」<sup>26</sup>。所謂「馬即墨」，即時任即墨知縣馬登高<sup>27</sup>。十一月，禪室初就。萬曆十五年，修造殿宇。萬曆十八年，殿宇成。萬曆十九年，李太后「造檀香毗盧佛像，建大殿」<sup>28</sup>。至此，海印寺建成。

海印寺作為皇家佛寺，殿堂佛像莊嚴崇麗，「頗極體勢之壯」<sup>29</sup>。寺院經濟也逐步建立，後來嶗山道士控告德清「白佔山場數處」<sup>30</sup>，「勢佔民產三千餘畝」<sup>31</sup>，

<sup>23</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一年癸未，CBETA, X73, no. 1456, p. 837, c23-p. 838, a7。

<sup>24</sup> 明神宗：〈續入藏經護敕〉，見《金陵梵剎志》卷三十一〈聚寶山報恩寺〉。

<sup>25</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四年丙戌，CBETA, X73, no. 1456, p. 838, b10-18。

<sup>26</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四〈謝毛文源待御〉，CBETA, X73, no. 1456, p. 561, a3-24。

<sup>27</sup> (清)林溥修，周翕鑽等纂：同治《即墨縣志》卷六〈職官·知縣〉，清同治刊本。

<sup>28</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九年辛卯，CBETA, X73, no. 1456, p. 839, c11-12。

<sup>29</sup> (明)高出：《鏡山庵集》卷十七〈觀海印寺故址〉，明天啟刻本。

<sup>30</sup> (民國)周宗頤：《嶗山太清宮志》卷一〈耿真人傳〉，方志出版社，2008年。

<sup>31</sup> (明)耿義蘭：〈控憨山疏〉，見青島市史志辦公室：《青島市志·嶗山志》，新華出版社，1999

罪名雖是捏造，但海印寺有「山場數處」、「民產三千餘畝」當是事實。海印寺建成後，德清在嶗山立足安居，修行傳教條件大大改善。

## 第二，修行證悟，禪、教兼通，尤致意於華嚴。

德清一生實修實悟，反對禪門的空疏和狂狷作風。但初至嶗山，「率多勞動，未得寧止，故多疲倦」。至萬曆十四年十一月，「禪室初就，始得安居」<sup>32</sup>，讀經著述。此前居五台山，「參究向上」，他以《首楞嚴經》印證，「豁然有得」。至嶗山，「枯坐三年，偶閱此經」。一夕，「於海湛空澄、雪月交光之際，恍然大悟，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沈，如空花影落」<sup>33</sup>。他說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華落，大地都歸寂滅場」<sup>34</sup>。吳應賓將此悟稱為「牢山之會心也」，為其「得宗通之相三」<sup>35</sup>。萬曆十七年，德清「閱藏，為眾講《法華經》、《起信論》」。他自別五台，時有省親之心，「且恐落世諦也，姑自驗之」。一夕，靜坐，忽開眼，有偈曰：「煙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遊一鏡中。昨夜忽沈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驪龍」。乃急呼侍者曰：「吾今可歸故鄉見二老矣」<sup>36</sup>。吳應賓稱其「靜中機發，不因心念，意在舌端」，推其為「得宗通之相四，蓋自是迴真入俗，而有省觀之遊」<sup>37</sup>。一天，他應請「說《法華經》，至〈方便品〉，感佛恩深，不覺痛哭流涕者再，於實相之旨，恍然不疑」<sup>38</sup>。先是在五台山發悟後，「無人請益」，德清亦曾「展《楞伽》印證」，「全經旨趣，了然無疑」。至萬曆二十年夏，他在嶗山，「偶患足痛，不能忍，因請此經置案頭，潛心力究，忽寂爾忘身。及開卷讀百八義，了然如視白黑」<sup>39</sup>。

隨著證悟修行的精進，德清的佛學造詣不斷提昇。吳應賓總結德清的一生，指出他「二十六，北遊，出入燕晉，得自在三昧於台山。三十八，遁跡東海之那羅延窟，久之，得六種就。踰五十，放於嶺南，而以出家優婆塞，大振曹溪之

年，第 684-686 頁。

<sup>32</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四年丙戌，CBETA, X73, no. 1456, p. 838, b21-22。

<sup>33</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九〈首楞嚴經通議序〉，CBETA, X73, no. 1456, p. 596, c23-p. 597, b8。

<sup>34</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四年丙戌，CBETA, X73, no. 1456, p. 838, c1-3。

<sup>35</sup> (明)吳應賓：〈大明廬山五乳峰法雲禪寺前中興曹溪嗣法憨山大師塔銘有序〉，見《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五〈附錄〉，CBETA, X73, no. 1456, p. 847, c6-8。

<sup>36</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七年己丑，CBETA, X73, no. 1456, p. 838, c19-23。

<sup>37</sup> (明)吳應賓：〈大明廬山五乳峰法雲禪寺前中興曹溪嗣法憨山大師塔銘有序〉，見《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五〈附錄〉，CBETA, X73, no. 1456, p. 847, c8-12。

<sup>38</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九〈妙法蓮華經通義後序〉，CBETA, X73, no. 1456, p. 597, b9-c22。

<sup>39</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三〈觀楞伽寶經閣筆記〉，CBETA, X73, no. 1456, p. 625, a17-c20。

鐸」。可見，德清在嶗山期間完成了佛學證悟，不僅深入禪宗，而且對華嚴宗有很深造詣，「得六種〔成〕就」，「謂信、聞、時、主、處、眾，此六具足，法緣方興」<sup>40</sup>，其於天台宗、淨土宗等亦有涉獵。吳應賓說：「妙喜（即大慧宗杲，引者注）大悟十八，小悟無數。個中冷暖，惟師（指憨山德清，引者注）自知。意者菩薩根力，次第增上」<sup>41</sup>。德清重視淨土念佛的作用，認為其可以「統攝三根、圓收頓漸」，主張參禪的同時兼修淨土，念佛即是參禪。德清提倡的念佛，主要是方便易行的持名念佛，「僧家功課之法，不必拘套，但以念佛為主」<sup>42</sup>。

嶗山期間，德清開始撰寫佛學著作。前述萬曆十四年他閱《首楞嚴經》，「則全經觀境，了然心目，隨命筆述《楞嚴懸鏡》一卷」<sup>43</sup>。次年，他為居士作《心經直說》。萬曆十六年，因學人之請，德清「創意述《〔楞嚴〕通議》，已立大旨」<sup>44</sup>。萬曆十八年，他「閱《楞嚴》、《法華》次，有請益老、莊之旨者」，遂作《觀老莊影響論》，「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sup>45</sup>。顯然，德清已經從一位佛法造詣高深的高僧成長為禪教兼通、著述弘法的佛教大師。

### 第三，講經說法，授徒傳戒，接待參訪。

德清初至嶗山，弟子不多。《明實錄》記載，德清「與其徒大林、大義遊行至即墨勞山，得舊觀音庵址，建寺居之，名曰海印」<sup>46</sup>。大林，未知其詳。大義即德宗，原為山陰王家僧，福登「法親」。五台山祈嗣法會後，福登命其隨德清為侍者。入嶗山初，條件艱苦，德宗「實甘心焉」。朝廷賜藏建寺，德宗主持「經營事務」<sup>47</sup>其「為法懇誠之心，未嘗一念稍間」。德清「唯以不思議智炬照之而已」<sup>48</sup>。

海印寺建立後，「四方衲子日益至」。如，僧果然，休甯汪氏子，「販牛為生」。一日，「見牛見異相，大驚，遂改業」。尋至山東，「時憨山清公遁跡牟

<sup>40</sup>（唐）釋澄觀疏義，（明）釋德清提挈：《華嚴綱要》卷一〈世主妙嚴品第一〉，CBETA, X08, no. 240, p. 493, b22-23。

<sup>41</sup>（明）吳應賓：〈大明廬山五乳峰法雲禪寺前中興曹溪嗣法憨山大師塔銘有序〉，見《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五〈附錄〉，CBETA, X73, no. 1456, p. 847, b2-c14。

<sup>42</sup>《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答德王問〉，CBETA, X73, no. 1456, p. 528, a24-b1。

<sup>43</sup>《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四年丙戌，CBETA, X73, no. 1456, p. 838, c3-5。

<sup>44</sup>《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六年戊子，CBETA, X73, no. 1456, p. 838, c14-17。

<sup>45</sup>《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四十五〈觀老莊影響論·敘意〉，CBETA, X73, no. 1456, p. 766, a8-24。

<sup>46</sup>《明神宗實錄》卷二百八十五，萬曆二十三年五月丁酉。

<sup>47</sup>《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CBETA, X73, no. 1456, p. 472, b3-18。

<sup>48</sup>《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一〈菩提心願文跋〉，CBETA, X73, no. 1456, p. 683, c4-p. 684, a13。

山，謁之，隨乞剃髮，服勤五載」<sup>49</sup>。萬曆十五年秋，胡來貢「請告歸田，攜其親之子送出家，為侍者，命名福善」<sup>50</sup>。明桂，西蜀李氏子。年十七出家，先後參謁伏牛山法光、京師真圓，「復從大方宗師請益機緣」。後至嶗山，「受金剛寶戒」。德清「每為曲唱傍通，方便調伏者期年」。一日，「聞唯心宗旨，恍然自信，遂誓歸依」<sup>51</sup>。

德清安居立足，更多地為弟子們講經說法授戒，指導修行。如，萬曆十六年，「學人」讀德清《楞嚴懸鏡》，希望其進一步著述，「願字字消歸觀心」。萬曆十七年，德清「為眾講《法華經》、《起信論》」<sup>52</sup>。在德清的其他一些篇章中，也常見類似記載。如，「山居今日大眾結制，海印據座，說《法華經》」<sup>53</sup>；「學人真照，……謁余於那羅延窟。余政悲末法務本者希，乃為諸弟子誦《梵網戒》，照聞而有感，遂哀請授戒」<sup>54</sup>；「此《八大人覺經》，予昔居海上，時時書示弟子輩持誦」<sup>55</sup>。德清在一封信中說道：「鄙人自謂，世尊現身東方，安坐海印道場，日每諷誦《華嚴》，六時不斷。且又善巧說法，而以種種譬喻因緣，演說諸法。頓使天龍欣悅，頑石點頭，十方雲集，菩薩推擁不開」<sup>56</sup>。這裡說的恐怕不是「世尊」，而是德清自己在海印寺說法的情景。

各地僧人紛紛前來參訪請教，切磋討論。如，萬曆十四年秋，達觀真可與弟子密藏道開來訪，「具白重刻方冊大藏因緣，方且訂盟於窟中」<sup>57</sup>。德清、真可「心相印契」，真可「許生平矣」<sup>58</sup>。至萬曆十八年秋，真可弟子幻余法本又「來入海印，出所刻《棗柏大論》若干卷示〔德〕清」，介紹刻方冊藏的進展。德清欣然為作序，加以鼓吹宣傳<sup>59</sup>。方山映川法師，與德清初相識於「都市」，「相與莫逆於心」。至是，「杖策而來」，二人「把臂而遊，登金剛之峯，入那羅之窟，乘堅固之筏，泛海印之光，捫摸虛無，指揮萬象」<sup>60</sup>。

<sup>49</sup> (清) 閔麟嗣：《黃山志》卷2〈人物志〉下，清康熙刻本。

<sup>50</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五年丁亥，CBETA, X73, no. 1456, p. 838, c11-12。

<sup>51</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示無隱桂禪人〉，CBETA, X73, no. 1456, p. 471, b9-17。

<sup>52</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六年戊子、十七年己丑，CBETA, X73, no. 1456, p. 838, c14-19。

<sup>53</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二〈示周子寅〉，CBETA, X73, no. 1456, p. 539, c9-10。

<sup>54</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一〈血書梵網經跋〉，CBETA, X73, no. 1456, p. 683, a5-b8。

<sup>55</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一〈八大人覺經跋〉，CBETA, X73, no. 1456, p. 685, b23-c4。

<sup>56</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四〈與張守庵〉，CBETA, X73, no. 1456, p. 561, b1-22。

<sup>57</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九〈刻方冊藏經序〉，CBETA, X73, no. 1456, p. 595, c10-12。

<sup>58</sup> (明) 釋德清：〈達觀大師塔銘〉，見(明) 釋真可：《紫柏尊者全集》卷首〈塔銘〉，CBETA, X73, no. 1452, p. 140, b19-20。

<sup>59</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九〈刻方冊藏經序〉，CBETA, X73, no. 1456, p. 595, c9-p. 596, c3。

<sup>60</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一〈送方山映川法師幻游序〉，CBETA, X73, no. 1456, p. 617, c7-p. 618, a5。

對本地及外地一些名僧，德清主動交遊。本地僧人如性香、近悟等。性香，號桂峯，山東平度巨族子。「初從曙堂曉法師，受天台、賢首宗旨。再參少室小山書禪師，傳達摩心印。學究華梵，宗通性相」。後應請來住即墨靈山大覺寺，「日與諸弟子講明所業」，「未期年，道風大振」。萬曆十一年夏，德清來嶗山，「訪〔性香〕師於靈山之下」<sup>61</sup>，應請為作重修寺記。他們經常來往，德清贊其「法利之盛」，稱「其諸弟子能說法者居多」<sup>62</sup>。僧近悟在嶗山西南悟山重修觀音大士殿三楹，建成觀音庵。德清「歡喜讚歎」<sup>63</sup>，應請為作記。外地名僧如雲棲株宏、無言正道、瑞庵廣禎、無瑕明玉、愚庵真貴、達觀真可等。德清結識株宏於五台山，「談心甚契」。其後，二人保持聯繫，德清致信株宏，介紹自己在嶗山傳教的情況：「某去台山，將南歷百城，擬參座下。復為業力牽之東海，良以耽著枯寂，遂置身窮陬篋戾車地。因之矢心建立三寶，上報佛恩。亡軀盡命，鬱鬱十年於茲。向以道力孱弱，大為魔擾者，日月居半。以致取辱法門，見呵智者。今且猶不自量，乃戀戀窟中，以臂當轍，心心不退，豈宿習然哉？」<sup>64</sup>正道為曹洞宗第二十五代幻休常潤弟子，萬曆二十年十月繼任少林寺住持，德清「隨喜合掌而言」<sup>65</sup>，為作序勉勵。廣禎為京城龍華寺住持，曾訪德清於五台山，參加祈嗣法會，會後奉李太后命尋德清於嶗山，多次代表皇室到各地飯僧賜藏，後謝職獨居，「抱疾期年」，德清「從海上往問之」，與廣禎「把臂」相談，廣禎囑以後事<sup>66</sup>。明玉為京城慈慧寺名僧，寂，德清時住京城慈壽寺，應其俗子、慈慧寺住持真貴之請，「狀其事」<sup>67</sup>。而其中意義最為重大者，是他與真可在北京的交遊。萬曆二十年，真可遊方至京，恢復房山石經山隋僧靜琬塔院，並重藏所發現舍利。德清赴京相見，「即同過石經山」，為作二記，「相對盤桓四十晝夜」<sup>68</sup>。萬曆二十一年七月，真可又與德清商議「修我朝《傳燈錄》」，德清「以禪宗凋敝」，約真可「往浚曹溪，以開法脈」，真可「先至匡山以待」<sup>69</sup>。與真可交遊，德清的志願

<sup>61</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二〈重修靈山大覺禪寺記〉，CBETA, X73, no. 1456, p. 623, b10-c23。

<sup>62</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九〈示慧斧興後禪人〉，CBETA, X73, no. 1456, p. 523, a19-24。

<sup>63</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二〈重修悟山觀音庵記並銘〉，CBETA, X73, no. 1456, p. 622, c20-p. 623, a7。

<sup>64</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三〈寄蓮池禪師〉，CBETA, X73, no. 1456, p. 548, b11-20。按，篋戾車，梵文Mleccha，又作篋隸車、畢〔口\*栗〕車、彌離車、蜜利車、彌離車、彌戾車等，意為邊地、下賤種。

<sup>65</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一〈送無言道公住持少林序〉，CBETA, X73, no. 1456, p. 616, a21-b16。

<sup>66</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九〈金台龍華寺第八代住山瑞庵禎公塔銘〉，CBETA, X73, no. 1456, p. 668, c14-p. 669, c2。

<sup>67</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九〈慈慧寺無瑕玉和尚塔銘〉，CBETA, X73, no. 1456, p. 670, c16-p. 671, b8。

<sup>68</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二十年壬辰，CBETA, X73, no. 1456, p. 839, c14-19。

<sup>69</sup> (明)釋德清：〈達觀大師塔銘〉，見(明)釋真可：《紫柏尊者全集》卷首〈塔銘〉，CBETA, X73,

和認識也從區區修復大報恩寺擴展到宏大的復興晚明佛教，表現出大師情懷。

德清在海印寺講經說法，名聞天下，「其時凡聖交接，遐邇悉赴，兩曼陀羅華、曼殊沙華，諸天恍忽來聽修多羅」<sup>70</sup>海印寺「道俗皈依」，「漸成大叢林」<sup>71</sup>。

#### 第四，結緣宮廷，皈化太后，志復大報恩寺。

如前所述，德清起初離開南京而到各地參訪遊學，主要目的是提昇佛法造詣，覓緣待機修復大報恩寺。至此，德清與李太后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把修復大報恩寺的希望寄託在李太后身上。時朝廷給各大寺院頒賜大藏經，德清先順勢為大報恩寺請藏。萬曆十七年十月，德清「至京請藏，上即命送齋行」。十一月，德清奉送敕賜大藏經到達南京大報恩寺，據說「寶塔放光連日」。迎經之日，「塔光如橋，向北迎經，僧自光中行」。安經建道場，「光相日日不絕」。時「瞻禮者日萬餘人，以為稀有之瑞」。迨迴京覆命，德清遂向李太后具奏大報恩寺始末，且云：「工大費巨難輕舉，願乞聖母日減膳羞百兩，積之三年事可舉，十年工可成」。李太后「大悅，即命於是年十二月儲積始」<sup>72</sup>。

萬曆十八年春，德清為李太后「代書《法華經》」。至萬曆二十二年十月，德清入京賀李太后五十大壽。賀畢，李太后「留過歲，請說戒於慈壽寺」。德清「以修本寺因緣，知聖母儲已厚，乃請舉事」。但時值日本侵略朝鮮，明朝派兵援朝抗倭，兵餉耗費巨大。所以出內帑修大報恩寺事，神宗命「姑徐之」，「乃寢」<sup>73</sup>。至次年二月，德清被謫戍，其借助李太后之力修復大報恩寺的志願終究未能實現，留下永遠的遺憾。對此，德清弟子福徵在疏釋德清年譜時說：德清「初從報恩至京師，本為興復〔大報恩寺〕發心」，「從台山至京師，亦為興復看緣。從京師隱牢山，從牢山得請藏還寺，復請積儲，將成緣事，無非台山修寺志願」<sup>74</sup>；「非為修寺，不入賀留京」，「修報恩本寺因緣，聖母儲已厚，事幾成，而緣寢不就，了從前北游本心」<sup>75</sup>。

慈壽寺在京師阜成門外八里，萬曆四年李太后興建<sup>76</sup>，又稱「上方兜率院」，

no. 1452, p. 141, a6-7。

<sup>70</sup> (清)李煥章：《織水齋集·游勞山記》，清乾隆鈔本。

<sup>71</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七〈憨山之譴〉，中華書局，1959年。

<sup>72</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七年己丑，CBETA, X73, no. 1456, p. 839, b7-13。

<sup>73</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二十二年甲午，CBETA, X73, no. 1456, p. 840, a3-6。

<sup>74</sup> 《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萬曆十一年癸未。

<sup>75</sup> 《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sup>76</sup> 參閱何孝榮：《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27頁。

極盡富麗奢華。德清在此說戒，「禮賜綦隆」。經過多年接觸和瞭解，李太后至此皈依德清，成為其俗家弟子。據記載，萬曆二十二年臘八日，李太后「特命近侍陳儒賜毗盧帽、織錦紫伽黎、志公鞋及內衣，上下悉大絨」。德清「悉謝不受，三賜乃受，受仍不服」。賜衣之日，李太后命內侍傳旨，「欲延〔德清〕入宮，面請法名」。德清「知非上意，力謝以祖宗制，僧不入宮」。李太后「乃遣內侍繪像命名以進」，「懸像內殿，令上侍立，拜受法名」<sup>77</sup>。

由於深得李太后崇信，德清也得到了宮中妃嬪、宦官、宮女的崇拜。海印寺的修建，就是李太后帶領宮中妃嬪、宦官、宮女等施捨資金。尤其是宦官，德清在嶗山傳教，「大璫輩慕之，爭往頂禮」。李太后宮中太監張本「尤尊信，言之太后，內出全藏經賜之」<sup>78</sup>。

### 第五，交結王臣士庶，談佛論禪，傳播佛教。

德清除了在寺中參禪修佛悟道、授徒傳戒以外，也注重將佛法與世間法緊密結合，以出世人作入世事。他更為積極而深入地結緣皇室，交遊王臣士庶，一方面利用佛教「陰翊王度」，直接為封建統治服務，另一方面，德清與他們談儒論佛，指導修行，傳播佛教，同時爭取其護持佛教，保障佛教的傳播與發展。

德清在嶗山期間交遊的藩王有山陰王、德王。山陰王好佛，妙峯福登為其替僧。萬曆初年，德清與福登共赴五台山，路過山陰王封地山西蒲州，得到其接待、崇禮（詳見前文）。德清居嶗山期間，仍與其交遊。得知山陰王「日深如幻三昧，諸有並空，寸心無住」，德清致書加以鼓勵：「惟願大檀安心一境，平視死生，是則把臂寂場，至無盡際，豈直千里同風者比哉」<sup>79</sup>。德王封地在山東，德清「屢荷垂慈，眷顧殷勤」。後德清覲見，「問道談心」，「且感信心彌篤，採納不疑，句句投機，心心在道」。德王「以有限生死為懼，無常病苦為懷」，德清表示肯定。德王「問日用工夫」，德清修書一封，詳細作答：「戒殺生可以延年壽，寡淫欲可以卻疾病，息妄想可以明真心，斷煩惱可以出苦趣，念佛可以生淨土，寬仁可以治國家，懺悔可以滅罪障，慈悲可以養臣民。歌唱盈耳，不如念佛千聲。嬉遊終朝，不如靜坐一日。此上功德，乃卻病延年、多嗣永祚之妙法也」<sup>80</sup>。

德清與眾多的高官名士交遊。其中，有在其出入京師期間，有在嶗山住坐之時。時人董其昌記載，萬曆十六年冬，與唐文獻、袁宗道、瞿汝稷、吳應賓、吳

<sup>77</sup> 《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sup>78</sup> 《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七〈憨山之譴〉。

<sup>79</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四〈與蒲州山陰王〉，CBETA, X73, no. 1456, p. 557, b12-c7。

<sup>80</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四〈上山東德王〉，CBETA, X73, no. 1456, p. 557, a4-b11。

用先、蕭雲舉等達官名士「同會於龍華寺，憨山禪師夜談」，在討論《中庸》「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句義時，董其昌與瞿汝稷觀點不同，「唐、袁諸君子初依法門，未能了余此義，即憨山禪師亦兩存之，不能商量究竟」<sup>81</sup>。從記載來看，德清不僅平等地參與討論儒學問題，而且最後還擔當了評判者的角色。吳應賓也談到了當時德清在龍華寺的談佛論禪：「余小子應賓之在中秘也，偕同參數子，請益牢山憨公於龍華精舍。蕭宗伯玄圃〔雲舉〕暨吾家司馬體中〔吳用先〕與焉。所聞非帝網之十玄，則祖燈之五葉，而師特以體究念佛為露地兩輪」<sup>82</sup>。可見，德清充當了這些達官名士的宗教導師，指導修學禪、華嚴、淨土等宗學。時人王元翰的記載，也反映了這一時期德清在京師與眾達官名士交遊的情景：「其時，京師學道人如林，善知識則有達觀〔真可〕、朗日〔本智〕、憨山〔德清〕、月川〔鎮澄〕、雪浪〔洪恩〕、隱庵、清虛、愚庵〔真貴〕諸公，宰官則有黃慎軒〔輝〕、李卓吾〔贇〕、袁中郎〔宏道〕、袁小修〔中道〕、王性海〔爾康〕、段幻然〔然〕、陶石簣〔望齡〕、蔡五嶽〔善繼〕、陶不退〔珽〕、蔡〔槐庭〕承植諸君，聲氣相求，函蓋相合，莫不日髯公語，語皆從悟後出，遂更相唱迭，境順心縱」，「凡諸道者，或披緇而學淹半滿，或服儒而誓了死生，或戒律精進而欽服鬼神，或舌根廣長而訶詈佛祖，洵法門龍象，佛口兒孫」<sup>83</sup>。

至於山東官員，德清交往也不少。李太后賜藏建海印寺於嶗山，巡按御史毛在大力支持。後德清致信毛在，言及寺中興建碑亭，並希望其與「大中丞」即時任山東巡撫李戴各為撰寫碑文，「不獨山靈增重，萬世之下，猶窺妙音色相於孤峯片石間也」<sup>84</sup>。萊州知府薛承範，也應請撰寫了碑記<sup>85</sup>。萬曆二十二年三月，時任山東巡撫鄭汝璧（崑崖）也「入山見訪問法」，德清「為說方便語」<sup>86</sup>。

德清交遊的當地鄉紳士庶更多。如，萊州人胡來貢歷任山西平陽知府、山西按察副使、參政，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對德清一直很尊崇，多次請教佛法，結下友誼。萬曆十五年秋，胡來貢「請告歸田」，常來海印寺拜訪請教，與德清「遊戲於海印光中」，「其樂殊未央也」<sup>87</sup>。嶗山中，黃氏家族最大，「諸子

<sup>81</sup> (明)董其昌：《容台集別集》卷一〈禪悅〉，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82</sup> (明)吳應賓：〈大明廬山五乳峰法雲禪寺前中興曹溪嗣法憨山大師塔銘有序〉，見《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五〈附錄〉，CBETA, X73, no. 1456, p. 847, a6-15。

<sup>83</sup> (明)王元翰：《王諫議全集》卷十〈與野愚僧〉，清嘉慶刻本。

<sup>84</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四〈謝毛文源待御〉，CBETA, X73, no. 1456, p. 561, a3-24。

<sup>85</sup> (明)薛承範：〈新建海印寺碑〉，見《青島市志·嶗山志》，第726頁。

<sup>86</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二十二年甲午，CBETA, X73, no. 1456, p. 840, a2-3。

<sup>87</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四十〈祭大中丞順庵胡公文〉，CBETA, X73, no. 1456, p. 759, c11-p. 760, a21。

漸漸親近」<sup>88</sup>。兵部尚書黃嘉善弟黃納善，字子光，時年十九歲，「即歸依請益，授以《楞嚴》，二月成誦。從此齋素，雖父母責之，不異其心。切志參究，齋不至席」。黃納善「恒求出家」，德清「絕不聽」<sup>89</sup>。於是，他「時來安坐海印光中，與諸幻眾揮塵默談」<sup>90</sup>。

居嶗山期間，德清交接了大批王臣士庶，區域涉及山東、京師、山西乃至全國各地。《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至十二「法語」部分有許多篇目，可以看出是德清這一時期對僧眾和王臣士庶的開示；卷十四至十八中共收入他與居士宰官近九十人的書信，大多是嶗山期間結交的。德清已成為當時的佛教領袖，為道俗所歸依信向。

### 第六，賑饑救窮，壓制羅教。

德清關注民眾疾苦。萬曆十二年，李太后因德清在嶗山「無房舍」，即發三千金，「以修庵居」。中使持金至，德清不同意，力止之曰：「我茅屋數椽，有餘樂矣，何用多為？」中使「強之，不敢覆命」<sup>91</sup>。時山東尤其是嶗山所在的登州、萊州一帶連遇災傷。萬曆十一年，「登州府大饑，糴於遼」<sup>92</sup>。萬曆十二年，「登、萊二府水旱相仍」<sup>93</sup>。德清遂決定，以此銀兩賑濟災民。他表示：「古人有矯詔濟饑之事，今山東歲凶，何不廣聖慈於饑民乎？」他「乃令僧領來使遍散各府之僧道孤老獄囚，各取所司印冊繳報」<sup>94</sup>。至萬曆二十一年，「山東大饑，餓死者載道」。德清又將「山中所儲齋糧，盡分賑近山之民」。寺中儲糧不足，他不辭勞苦和艱險，「乘便舟至遼東，糴豆數百石以濟之」。由於德清積極賑災，「邊山四社之民，無一饑死者」<sup>95</sup>。

德清初至嶗山，當地盛行羅教。羅教創始人羅清，即墨人，年青時為邊境戍軍，生活艱苦。成化後期，他自稱得道，吐「五部六冊」，創立羅教。適應底層民眾

<sup>88</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三年乙酉，CBETA, X73, no. 1456, p. 838, b4-5。

<sup>89</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七年己丑，CBETA, X73, no. 1456, p. 839, a22-23。

<sup>90</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五〈與黃子光〉，CBETA, X73, no. 1456, p. 563, c4-14。

<sup>91</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二年甲申，CBETA, X73, no. 1456, p. 838, a11-21。

<sup>92</sup> 雍正《山東通志》卷三十三〈五行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93</sup> 《明神宗實錄》卷一百五十二，萬曆十二年八月壬子。

<sup>94</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二年甲申，CBETA, X73, no. 1456, p. 838, a21-24。

<sup>95</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53〈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二十一年癸巳，CBETA, X73, no. 1456, p. 839, c21-24。

擺脫苦難、追求幸福生活的願望，羅清創造出「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真訣。他雜揉佛教禪淨思想和道教清淨無為觀念，鼓吹只要信眾修行其「無為法」，「無生老母」就會下凡解救受苦受難的皇胎兒女，迴到永恆、真實、圓滿的「真空家鄉」，獲得「無生」的「永生」<sup>96</sup>。羅教創立後，對底層貧苦民眾有很大的吸引力，「愚夫愚婦率多樂於從事」<sup>97</sup>，「蔓引株連，流傳愈廣，蹤跡詭秘，北直隸、山東、河南頗眾」<sup>98</sup>。受到羅教的衝擊，一些地區佛教反而無人信奉。嶗山地區為羅清家鄉，當地羅教勢力更為盛行。德清稱，「方今所云外道羅清者，乃山下之城陽人，外道生長地，故其教遍行東方，絕不知有三寶」。德清住錫嶗山，通過講經說法，宣揚正信佛教，輔以賑濟災荒等慈善活動，切實關注和解決貧苦民眾疾苦，加上他結緣宮廷，交遊王臣士庶，影響很大，「漸漸攝化，久之，凡為彼師長者，率眾來歸，自此始知有佛法」<sup>99</sup>。這樣，嶗山地區原本盛行的羅教受到壓制，佛教勢力逐漸興起。時人稱，「初，牢山人多從異教，不知佛法」，德清「住山十三年（應為十二年，引者注），方便說法，信從者日眾」<sup>100</sup>，「說法十二年，不具之區，恍若化國」<sup>101</sup>。

### 三、海印寺官司

佛教在嶗山地區迅速傳播，終與當地道教勢力發生衝突，從而爆發了一場跨度達七年的官司，德清最後以「私創寺院」罪名謫戍雷州。

#### 1、嶗山道教

嶗山素有「神仙窟宅」、「洞天福地」美譽，據說春秋戰國時期就有方士在此修煉。《嶗山太清宮志》記載，西漢武帝建元年間，道士張廉夫來此建「三官廟」，「又建築殿宇，供奉三清神像，額曰太清宮」<sup>102</sup>，為嶗山道教之始。其實，這一記載並不可信，因當時道教還未創立，「三清」觀念在南北朝以後才逐漸形成<sup>103</sup>。

嶗山道教發端在唐宋時期。唐末，嶗山出現了第一位有名的道士李哲玄，

<sup>96</sup> 參閱韓秉方：〈羅教及其社會影響〉，載《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濮文起：《秘密教門——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溯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60頁；何孝榮等：《明朝宗教》，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330-338頁。

<sup>97</sup> （明）釋道開：《藏逸經書標目·五部六冊》，民國刻本。

<sup>98</sup> 《明神宗實錄》卷一百八十二，萬曆十五年正月庚子。

<sup>99</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大師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三年乙酉，CBETA, X73, no. 1456, p. 838, b7-8。

<sup>100</sup> 《清涼山志》卷三〈高僧懿行·憨山大師傳〉。

<sup>101</sup> 《織水齋集·復游勞山記》。

<sup>102</sup> 《嶗山太清宮志》卷一〈開山始基〉。

<sup>103</sup> 參閱劉懷榮：〈嶗山道教及其在中國道教史上的地位〉，載《東方論壇》1995年第3期。

「建殿宇，供奉三皇神像，名曰三皇庵」。後周時，封為「道化普濟真人」<sup>104</sup>。後唐同光二年（924），道士劉若拙自蜀來訪李哲玄，「相談契合，遂留住焉。自修一庵，額曰驅虎，供奉老子聖像，潛修於中」。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劉若拙入覲，「談玄稱旨，封華蓋真人」。後迴山，「傳授道要」<sup>105</sup>，創立道教華蓋派。

金元時期，嶗山道教進入興盛期。時全真道北宗創立者王喆（號重陽子）往來於登、萊一帶，先後收丘處機、劉處玄等七大弟子。宋甯宗慶元元年（1195），全真七子來到嶗山太清宮，「講道傳玄，宏闡教義，道眾大悅，各受戒律」。不久，丘處機等西去，劉處玄留在太清宮，傳隨山派。其後，丘處機也曾「重來本宮，說法闡教」<sup>106</sup>，龍門派又盛。元末，全真道武當派張三豐曾來嶗山，「遁跡驅虎〔庵〕數年」<sup>107</sup>。

明朝前期、中期，嶗山道教衰微，沒有可稱述的名道。嘉靖年間，嶗山龍門派有徐復陽創鶴山派，孫玄清創金山派，齊本守創金輝派，稍有振興之象。然而，新創教派並沒有什麼理論創新，在全國也缺乏影響。作為隨山派祖庭的太清宮繁盛不再，萬曆年間「傾圮甚，羽流竄亡，一二香火守廢基，苦無藉」<sup>108</sup>。

## 2、海印寺官司

德清初至嶗山，見太清宮內有古觀音庵廢基，「可以廣僧寮、演大乘」<sup>109</sup>，遂「初掩片席於樹下」，後「誅茅結廬」而居。時「羽流窘甚，舉地售之」<sup>110</sup>。在李太后資助下，德清廢太清宮，建海印寺。對此，德清說：「地名觀音庵，蓋古剎也，唯廢基存焉。考之，乃元初七真出於東方，假世祖威福，多佔佛寺，改為道院。及世祖西征迴，僧奏聞，多命恢復。唯牢山僻居海上，故未及之耳。予喜其地幽僻，真逃人絕世之所，志願居之」<sup>111</sup>。《明神宗實錄》也記載：德清「得舊觀音庵址，建寺居之，名曰海印」<sup>112</sup>。可見，海印寺建在觀音庵廢址上，而觀音庵廢址則在太清宮內。至於「海印寺」名稱的來歷，《明神宗實錄》記載是送大藏經太監張本擅取<sup>113</sup>，而德清記載為李太后所賜。從常理上推測，寺名可能確

<sup>104</sup> 《嶗山太清宮志》卷一〈李真人傳〉。

<sup>105</sup> 《嶗山太清宮志》卷一〈華蓋真人傳〉。

<sup>106</sup> 《嶗山太清宮志》卷一〈七真降臨太清宮事蹟記〉。

<sup>107</sup> 《嶗山太清宮志》卷一〈張三豐祖師傳〉。

<sup>108</sup> （明）黃宗昌纂、（清）黃坦增補：《嶗山志》卷五〈仙釋·德清〉，民國刻本。

<sup>109</sup> 《嶗山志》卷三〈名勝·下清宮〉。

<sup>110</sup> 同治《即墨縣志》卷十二〈雜稽·釋道·德清〉，清同治刻本。

<sup>111</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一年癸未，CBETA, X73, no. 1456, p. 837, c24-p. 838, a6。

<sup>112</sup> 《明神宗實錄》卷二百八十五，萬曆二十三年五月丁酉。

<sup>113</sup> 《明神宗實錄》卷二百八十五，萬曆二十三年五月丁酉。

為張本所取，但經李太后「敕賜」。所以釋福徵說：「海印寺命名，請自聖母令旨」<sup>114</sup>。

德清初到嶗山，尚能與當地道教界友好相處。他佛學造詣高，文字好，聲名大，因此頗為嶗山道士尊重，相與交遊。嶗山巨峯頂有白雲庵，嘉靖年間全真道士郭一「重起」，徒李陽興「繼業」，孫高來德「大新之」，至萬曆七年「甫就」。萬曆十一年夏，德清「策杖其顛」，參訪其庵。後高來德來訪，德清應請「為記」<sup>115</sup>。再如，即墨縣東南十里許之罙山有浮佑侯神廟，年近九十的全真道士高常清「居之，幾三十年」。在「戚將軍」資助下，萬曆十五年秋高常清重修神廟，「不期年落成」。他「杖策過海印」，德清也應請為作記<sup>116</sup>。

隨著海印寺的修建，佛教在嶗山日益興盛，道教越發衰微，一些嶗山道士開始忿忿不平。部分鄉紳也趁機勾結道士、無賴，企圖佔奪寺址，訛索德清。於是，嶗山佛、道原本友好相處的局面被打破。對此，德清在自序年譜萬曆十八年條記載：海印寺「殿宇成」，「時有鄉宦欲謀道場者，乃構方外黃冠，假稱佔彼道院，聚集多人，訟於撫院。開府李公先具悉其事，痛恨之，下送萊州府，窮治其狀」<sup>117</sup>。「開府李公」即時任巡撫李戴。查《明神宗實錄》，萬曆十四年二月，山西左布政使李戴被擢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至十七年六月，李戴陞刑部右侍郎，以福建左布政使宋應昌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宋應昌繼任至二十年四月。可見，鄉紳勾結道士等控告德清「佔彼道院」，實發生在萬曆十七年六月以前李戴擔任山東巡撫任上。德清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說：「〔海印寺〕豎立未幾，狂魔競作。己丑歲（萬曆十七年，引者注），即遭侵撓」<sup>118</sup>。道士等所控不實，李戴先已得知內情，批給萊州府嚴審，鄉紳、道士等糾集數百人，包圍府城，哄鬧示威，甚至要殺死德清。知府聞之，「即遣多役並捕之，彼眾惶懼，皆叩首求解免」。在德清勸解下，知府「乃令地方盡驅之，狂眾不三日盡行解散，由是此事遂以寧」<sup>119</sup>，「魔風頓息矣」<sup>120</sup>。

這場官司只是暫時平息了。其時，領頭控告德清的是道士耿義蘭。據《嶗山

<sup>114</sup> 《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sup>115</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二〈重修巨峰頂白雲庵玉皇殿記並銘〉，CBETA, X73, no. 1456, p. 623, a8-b9。

<sup>116</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二〈重修之罙山神廟記並銘〉，CBETA, X73, no. 1456, p. 622, a8-b2。

<sup>117</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八年庚寅，CBETA, X73, no. 1456, p. 839, b16-18。

<sup>118</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CBETA, X73, no. 1456, p. 471, c16-p. 472, c14。

<sup>119</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萬曆十八年庚寅，CBETA, X73, no. 1456, p. 839, b18-c9。

<sup>120</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CBETA, X73, no. 1456, p. 471, c16-p. 472, c14。

《太清宮志》記載，耿義蘭字芝山，號飛霞，又號靈應子，山東高密人。生於正德四年（1509），「登嘉靖進士第」。他「慕玄風」，遇嶗山太清宮道士高禮巖，「拜為師」，同赴華山，「得趙靜虛真人傳道」。後入京，「住白雲觀叢林，參訪道理」。迴嶗山，「隱居慈光洞、黃石宮等處」，「於萬曆十三年，忽來勢僧，假稱奉旨，將本宮道士劉真湖等逐出，打死住持張德容，碑記神像盡拋於海，改太清宮為海印寺，又白佔山場數處」。耿義蘭「乃出，與本宮同志道士賈性全、劉真湖、張復仁、覃尋先等協力抗爭」。後耿義蘭官司得勝，萬曆二十八年，「蒙降旨復宮，頒道藏經」，神宗敕封為「扶教真人」。「於萬曆末年十月十五日飛昇，世壽一百一十歲」<sup>121</sup>。這一傳文有多處不可信，限於篇幅，這裡僅討論所謂太清宮道士被打死驅逐及宮觀被毀而耿義蘭仗義挺身控告德清問題。事實上，不僅是上引德清記載，即使當時其他人乃至後人，本地人與外地人，幾乎所有記載此事者，都稱耿義蘭是無賴勒索。僅舉幾例：「適即墨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云其地曾為道院故址，今宜復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愍〔山〕既不酬，且詬辱之」<sup>122</sup>；「道士耿義蘭者，寺中有所誦，見逆，出怨言，訟於公」<sup>123</sup>；「忽有麼麼黃冠耿義蘭，非此山宮觀眷屬，不知自何方來，魔愍大師甚，愍大師怒斥之，蘭乃走京師上書」<sup>124</sup>。而且，後來毀寺復宮，重建的太清宮住持賈性全立碑紀形勝地至，涉事記載也是：「〔德清〕因宮址為海印寺，並葺三官廟，以妥黃冠。黃冠者為鳴鳩逐鵲計，劾奏之」<sup>125</sup>。即德清建海印寺，仍修葺其中三官廟以安置道士，並無驅逐、逼死情節，這是當時太清宮的官方說法。

據耿義蘭說，萬曆十七年，他們向巡撫李戴控告，萊州府判耿義蘭「徒罪四年」。賈性全等於萬曆十八年八月「復告」，時任巡撫宋應昌再批轉府州審理，判決賈性全以「不應罪名」。道童連演書、劉真湖又告，宋應昌「批海防道轉行本府」再審，結果「劉真湖被誣，連演書方得釋放逃生」<sup>126</sup>。三個回合下來，眼見在山東告不贏，萬曆十九年，耿義蘭赴京告狀。但是，相關衙門一直無人理會。至萬曆二十三年二月，據說在白雲觀道長王常月幫助下，耿義蘭向明神宗遞上控告德清的奏疏。在奏疏中，耿義蘭列舉了德清多款罪狀：一，先年拜太監馮保為義父，隱匿宮中布施的用於五台山無遮法會的銀兩；二，「逃入山東，冒稱皇親出家」；三，「結黨白蓮教等教頭張鳴桂」；四，結納太監張本，拆毀太清宮，驅逐、打死道士，「改宮為敕建海印寺」，「勢佔民產三千餘畝」；五，交

<sup>121</sup> 《嶗山太清宮志》卷一〈耿真人傳〉。

<sup>122</sup> 《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七〈愍山之譴〉。

<sup>123</sup> 《嶗山志》卷五〈仙釋·德清〉。

<sup>124</sup> 《織水齋集·復游勞山記》。

<sup>125</sup> （明）趙任：〈太清宮形勝地至碑記〉，見《嶗山太清宮志》卷五。

<sup>126</sup> （明）耿義蘭：〈控愍山疏〉，見《青島市志·嶗山志》，第 684-686 頁。

結地方官，打壓控告的眾道士；六，萬曆十九年二月，詐稱皇家錢糧、佛像、佛經，「假持兵部明文」，用驛遞運送，「百計害民」；七，「現今造海船，蓋營房，駱駝運糧草」，「出沒異常」，有勾結「外國倭夷」嫌疑。耿義蘭要求皇帝「從公研審」，「乞將逆惡如律征剿，以救山東民於塗炭」，「若臣半字虛誑，自甘梟首」。神宗御批：「既屢控，巡撫理宜親審具奏，何疊批有司？黨援妖僧，害道殃民，是何情弊？仰刑部將經書、官員並一千人犯提審」<sup>127</sup>。

耿義蘭所列「罪狀」，每款都足可判德清以死刑。但這些「罪狀」基本上不是事實，所以明神宗也並不相信。三月，德清被逮至京師，「奉旨下鎮撫司打問，執事者先受風旨，欲盡招追向聖母所出諸名山施資，不下數十萬計，苦刑拷訊」。也就是說，對德清的審問並沒有按照耿義蘭控告各款而展開，承審官員受命審問的是李太后布施諸名山的銀錢都到哪裡去了。德清聲言要保護李太后和皇帝之間的慈孝，不能在帝后母子之間製造隔閡和矛盾，「以死力抵之」，「止招前眾布施七百餘金」。經「查內支簿，及前山東代賑之冊籍」，布施給嶗山的錢財被用於賑濟災民，並無靡費，神宗「意遂解」。由是，神宗「母子如初」。最後，神宗下令，「坐以私創寺院」，即以海印寺名非來自神宗敕賜，將德清「遣戍雷州」<sup>128</sup>。

### 3、德清謫戍原因分析

眾所周知，明初以來，為了抑制佛教勢力的膨脹，各朝不斷下令，嚴禁私創寺院。至萬曆二年十二月，禮科右給事中梁式稱，「今各處大小庵觀寺院不可數計矣，而日鼎建日繁，募徒相望」。神宗命「毀其太甚，罪其擅作」<sup>129</sup>。萬曆七年五月，戶部奏准，「申明舊制」，「禁私建院觀」<sup>130</sup>。萬曆十三年正月，神宗先是「詔毀天下私創庵院」。數日後，令停止執行，「仍禁以後不得私創，犯者重擬」<sup>131</sup>。但是，從明初開始，這些禁令基本上流為虛文，皇帝帶頭修建寺院，官員士庶也很少有人因為私建寺院受到懲處。況且，海印寺由李太后帶領後宮妃嬪等布施修建，是一所皇家寺院，寺名也來自李太后敕賜。李太后好佛，敕賜過不少寺名，但其他佛寺並未被坐以「私創寺院」而遭毀寺謫僧。顯然，明神宗以此罪名懲處德清並不能夠完全服眾。表面上看，德清因耿義蘭等控告其「私創寺院」而謫戍。實際上，其得罪的真正原因是他捲入了當

<sup>127</sup> (明)耿義蘭：〈控憨山疏〉，見《青島市志·嶗山志》，第684-686頁。

<sup>128</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四〈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下，萬曆二十三年乙未，CBETA, X73, no. 1456, p. 840, b14。

<sup>129</sup> 《明神宗實錄》卷三十二，萬曆二年十二月乙巳。

<sup>130</sup> 《明神宗實錄》卷八十七，萬曆七年五月辛未。

<sup>131</sup> 《明神宗實錄》卷一百五十七，萬曆十三年正月壬辰。

時的宮廷鬥爭，尤其是爭護「國本」等神宗與李太后的矛盾和衝突。表現為：

第一，德清順承李太后旨意，祈嗣保嗣，捲入「國本」之爭。原來，神宗不喜歡王氏及其所生皇長子常洛，而王皇后一直無子。所以，多數群臣按照封建禮制，不斷催促、逼迫神宗盡快冊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以定「國本」。但神宗在太子問題上企圖廢長立愛，欲冊立寵妃鄭氏於萬曆十四年生育的皇三子常洵，因此遭到了堅守封建禮法制度群臣的激烈反對，雙方為此鬥爭十五六年，是為爭「國本」。在宮中，李太后是王氏、常洛堅定支持者，始終站在維護傳統立儲制度的群臣一邊，與神宗對立<sup>132</sup>。德清順承李太后旨意，五台山祈嗣，「功在首倡」；應李太后請，「說戒於慈壽寺」，據說「慈壽保嗣」，大概涉及了爭護「國本」內容。神宗對爭「國本」諸臣降謫累累，正好耿義蘭控告疏上，神宗最終選擇其中較為靠譜的「私創寺院」罪名懲治德清。由此，神宗否定李太后布施修建且賜名的海印寺，逮捕、謫戍她崇信並皈依的德清，打擊李太后、德清二人，因為他們都是「國本」問題上與他對立者，甚至「國本」之爭由他們為王氏祈嗣而生發。故釋福徵說：「台山祈嗣，慈壽保嗣，〔德清〕以出世人干係國祚大事」，海印寺官司「卻與嶗山道士全沒交涉，惟道士沒影響，知宮廷水火矣」，「建儲之大關目、大是非，波累及之」<sup>133</sup>。

第二，李太后極度崇佛，且耗費過多，引起神宗不滿。李太后皈依德清，成為其俗家弟子。她甚至在宮內懸掛德清畫像，並命神宗也「侍立」，與她一起「拜受法名」，引起神宗不快和反感，所謂「上事聖母至孝，此日未免色動」<sup>134</sup>。另一方面，萬曆中期，國家財政危機日益加劇，而李太后好佛，大肆布施，宦官「讒構，動以煩費為言」，神宗「弗問也」，「其語頗聞於外廷，所司遂以師（指德清，引者注）為奇貨，欲因以株連慈聖〔李太后〕左右」<sup>135</sup>。株連「左右」，不可能不傷及李太后。神宗也不是「弗問」，德清稱神宗「惜財，素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煩。時內庭偶以他故，觸聖怒，將及聖母左右，大臣危之」<sup>136</sup>。德清被逮，神宗讓官員審問，希望他招供李太后宮中太監耗費錢財以崇佛，實際是也打擊太監「主人」李太后。德清以死抵抗，僅招供用太后布施七百餘金建寺，這才作罷。

<sup>132</sup> 參閱何孝榮：〈萬曆年間的國本之爭〉，載《山東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

<sup>133</sup> 《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sup>134</sup> 《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sup>135</sup>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六十八〈憨山大師廬山五乳峰塔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sup>136</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四〈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下，萬曆二十三年乙未，CBETA, X73, no. 1456, p. 840, a19-21。

第三，宦官忌恨德清與宦官之間內鬥。如前所述，李太后派往五台山祈儲的宦官害怕得罪神宗，不願意舉辦規模盛大的祈儲法會，與德清產生矛盾。後德清為修復大報恩寺，乞求李太后「日減膳羞百兩」。而據學者研究，時李太后慈寧宮宮膳花費最高，日均約銀九十二兩九錢<sup>137</sup>。不管李太后能否達到每日減膳饘百兩，但她確實開始行動，節衣縮食。到萬曆二十二年，「儲已厚」。慈寧宮節縮開支，無疑降低了宮中的生活標準，也減少了宦官借此貪污剋扣的銀兩。因此，「三年儲積之說，大不便於內官」<sup>138</sup>，也招致他們的忿恨。另外，太監張本得罪了神宗，遭同儕排限，所謂「牢山使者在內庭，他事觸上怒，內貴軋之，欲陷以死，因以搖慈聖」<sup>139</sup>。最後判決，張本「以詐旨論死」，德清「謫戍」<sup>140</sup>。

總之，海印寺官司最終失敗，德清被謫戍，真正原因是他捲入了當時的宮廷鬥爭。尤其是德清爭護「國本」，力圖維護傳統封建禮法制度，為神宗所嫉恨。他捲入了神宗與李太后的矛盾和衝突，「僧、道兩家只不過是他們相互傾軋的工具和犧牲品而已」<sup>141</sup>。

#### 四、結論

晚明佛教復興，龍象紛出，高僧不少，而雲棲株宏、達觀真可、憨山德清與蕩益智旭四人「尤為出類拔萃，末法所不多見」<sup>142</sup>，因此通常並稱為晚明佛教四大師，或晚明四大高僧。四大師有何「出類拔萃」、「末法所不多見」之處？或者說，他們為什麼能夠被稱為晚明佛教大師？下面，我們先以株宏、真可、智旭為例，剖析其群體特徵，再對比嶗山時期德清的佛學修為，展現其從高僧跨入大師的轉變。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先後形成大乘八宗，成為中國佛教。會昌滅佛以後，中國佛教逐漸衰微，除禪宗、淨土宗以外，其他各宗多難以為繼。明朝建立後，對佛教實行以整頓和限制為主，同時加以保護和提倡的政策。這一方面使佛教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出家人數不斷增加，佛寺持續修建，成化年間僧、道「共該五十餘萬」<sup>143</sup>，京城內外僅敕賜寺、觀就達 639 所<sup>144</sup>，

<sup>137</sup> 陳玉女：〈明萬曆時期慈聖皇太后的崇佛〉，載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二十三號，1997年。

<sup>138</sup> 《憨山大師年譜疏》卷上，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sup>139</sup> （清）彭孫貽：《茗齋集》卷十七〈題神祖御書白衣大士贊後〉，四部叢刊續編本。

<sup>140</sup> 《明神宗實錄》卷二百八十五，萬曆二十三年五月丁酉。

<sup>141</sup> 《青島市志·嶗山志》，第 343 頁。

<sup>142</sup> （民國）釋印光：《印光法師文鈔》卷一〈與佛學報館書〉，蘇州靈岩寺藏版，1991年。

<sup>143</sup> （明）馬文昇：《馬端肅奏議》卷三〈陳言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

佛教表面上相當繁盛。另一方面，明朝嚴禁僧人雜處民間、與俗混淆，並劃分教僧專門從事瑜伽法事，使其逐漸佔到僧團的半數，「呈現當時佛教趨向「山林佛教」、「死人佛教」、「經懺佛教」之特質」<sup>145</sup>。明朝中期以後，佛教各宗基本上沉寂不振，所謂「自宣德以後，隆慶以前，百餘年間，教律淨禪，皆聲聞闕寂」<sup>146</sup>，佛教本質上更加衰微<sup>147</sup>。

晚明佛教諸大師正是在明朝中期以來佛教極度衰微的背景下出現的，他們普遍以復興佛法為使命，擔負起挽救佛教危機的重任，在佛學思想和實踐方面頗多相似之處。首先，他們都是禪教兼通的高僧。祿宏早年曾參訪禪宗名宿德寶等人，於禪學有深厚造詣。他也是華嚴宗名僧，後世推為華嚴圭峯下第二十二世。他又是淨土宗大師，被稱為蓮宗第八祖。真可立足禪宗，但並不排斥天台、華嚴、唯識等，於諸宗均有造詣。智旭禪教兼通，尤致力天台，被稱為元照以後的唯一律學大家，是淨土宗第九祖。其次，他們都提倡諸宗融合、三教合一。祿宏主張禪、教一致，參禪不能離教，禪、淨同時修習，讀經、參禪的最終目的是往生淨土。他強調佛、儒、道三教「理無二致」，應「相資」、「相贊」。真可提倡禪、教合一，認為禪與文字、性與相都如水與波，圓融相通。真可會通佛、儒，認為儒家「五常」就是佛教「五戒」。智旭力主禪、教一致，參禪者應學習經典，否則不能悟道。他集天台、參禪、念佛諸法門於一身，鼓吹淨土信仰之殊勝。他認為三教同源於「自心」，以佛釋儒，以儒附佛。總之，祿宏、真可、智旭等鑑於佛教的嚴重弊端和深刻危機，提倡諸宗融合，禪教一致，「意在借助經教，提高僧徒的佛學素養」，「開闢一條通往近代佛教的道路」，「這條道路便是混融佛教」<sup>148</sup>，引領了當時佛教理論和修行的前行。再次，他們都修建寺院，講經說法，關注佛教發展。祿宏修建雲棲寺，弘法數十年。他著《阿彌陀經疏鈔》，強調淨土念佛；著《沙彌要略》、《具戒便蒙》、《梵網經疏發隱》，「發明」戒律；編《禪關策進》，與《高峯語錄》等並刊，指導參禪。祿宏還規範水陸儀軌、放生儀軌等佛教儀禮。對於天主教和羅教，他也加以批判。真可遊歷天下，復興古剎十五所。他見大藏經「卷帙重多」，力倡刊刻簡易的方冊大藏經（《徑山藏》、《嘉興藏》）。真可與德清約定，合修明朝《傳燈錄》。智旭長期住坐浙江孝豐靈峯寺，亦曾歷遊江浙閩皖諸省，不斷從事閱藏、講述和著作，「融會諸宗」，希圖依靠各宗共力來復興佛教。最後，他們皆交遊王臣士庶，關注民生社

倪岳：《青溪漫稿》卷十三〈止給度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144</sup> 《明憲宗實錄》卷二百六十，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

<sup>145</sup> 釋見曄：〈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討〉，載《東方宗教研究》1994年10月第4期。

<sup>146</sup>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華書局，1962年，第13頁。

<sup>147</sup> 參閱何孝榮：〈明代佛教政策述論〉，載《文史》2004年第3輯；何孝榮：《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739頁。

<sup>148</sup> 潘桂明：〈晚明『四大高僧』的佛學思想〉，載《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4期。

會。袞宏著〈放生文〉，傳誦海內，慈聖李太后嗟歎賜紫，遣人「諮問法要」。其「道風日播」，達官賢士及門問道者以百計，「靡不心折」<sup>149</sup>。真可遊歷各地，出入京城，神宗曾遣人問法，李太后亦加禮敬。他「戀戀長安，與縉紳日為伍」<sup>150</sup>，將救德清之謫戍、止礦監稅使橫徵暴斂、續修明朝《傳燈錄》視為平生「三大負」。智旭也關注民生疾苦。生當明末清初，他發願以己身代眾受苦，祈願眾生「徑超九蓮之土」，「永享太平之安」<sup>151</sup>。因此，晚明佛教諸大師「不像先前時期的著名僧人，並不是與世隔絕的個體存在，而是領導著一個充滿活力並自我維持的佛教僧人與民眾信徒的社團」<sup>152</sup>，他們復興晚明佛教，在當時社會有極大影響<sup>153</sup>。有學者稱，「晚明號稱佛法復興，社會關懷成為此際佛門一個鮮明的標誌」<sup>154</sup>。

正是具備了這些修行特徵，袞宏、真可、智旭等超出了當時的絕大多數僧人，成為佛門領袖，帶頭復興晚明佛教，引領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被後人尊為晚明佛教大師。憨山德清作為晚明佛教四大師之一，具足以上諸特徵。而通過本文研究，我們發現，德清具足這些特徵、完成從高僧到大師的轉變，即在隱居嶗山十二年間。表現在：

其一，德清完成了個人的佛學證悟。德清作為「禪門宗匠，而極力倡導禪淨一致，尤致意於華嚴」<sup>155</sup>。從出家開始，他實修實悟，通過不斷的參訪、學習，多次證悟，修證層次不斷提高。如前所述，吳應賓將德清佛法精進概括為「得宗通之相」四個層次，其中最後兩個層次即完成於嶗山期間。

其二，德清的佛學思想基本形成。他主張禪教一致，既指導參禪，又講授華嚴、法華、律宗等各宗經典注疏。他特別重視淨土念佛，認為念佛就是參禪。他對佛經有了自己的理解和領悟，撰寫了數部佛學著作。他鼓吹三教合一，以佛釋儒、道，以儒釋佛。其中，《觀老莊影響論》「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sup>156</sup>，表現出三教一致的思想傾向。儘管德清這一時期的佛學思想還稍顯薄弱，不盡完善，但畢竟基本成型，代表了當時的佛學進步傾向，引領著中國佛教的前行方向。

<sup>149</sup> (民國) 喻謙：《新續高僧傳四集》卷四十三〈明梵村雲棲寺沙門釋袞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sup>150</sup> 《明神宗實錄》卷三百七十，萬曆三十年三月乙丑。

<sup>151</sup> (清) 釋智旭：《靈峰宗論》卷一《禮千佛告文》，CBETA, J36, no. B348, p. 272, c22-24。

<sup>152</sup> [英] 崔瑞德、[美] 牟復禮：《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楊品泉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912頁。

<sup>153</sup> 何孝榮等：《明朝宗教》，第54-72頁。

<sup>154</sup> 廖肇亨：〈亂世與宗教信仰：從覺浪道盛與玉林通秀看清初佛教護國思想的兩種形態〉，載杭州文史研究會編：《首屆杭州佛教歷史文化學術論壇論文彙編》，第340頁，浙江杭州，2014年11月。

<sup>155</sup> 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第二輯，知識出版社，1982年，第292頁。

<sup>156</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四十五〈觀老莊影響論·敘意〉，CBETA, X73, no. 1456, p. 766, a8-24。

其三，德清復興了嶗山、北京等地的佛教。明代中期以來，佛教衰微至極。嶗山地區作為全真道祖庭之一，長期以來道教勢力較大。佛教雖有性香、近悟等的卓錫傳播，但都聲勢小，影響微。而明朝後期，羅教則廣泛傳播，在民間頗多信眾。德清來此住錫，「布慈雲於邊地，明佛日於重昏，開性海之原，轉文機之軸，下成佛之種子，孕作聖之胚胎」<sup>157</sup>，四方衲子日至，聽法受戒，建立起興盛的海印寺僧團。德清還走出寺院，向民眾傳播佛教，反對羅教，也使嶗山地區民眾普遍信奉佛教，羅教被完全壓制下去。德清所謂「東海蔑戾車地，素不聞三寶名，今予教化十二年，三歲赤子，皆知念佛。至若舍邪歸正者，比鄉比戶也」<sup>158</sup>。嶗山佛教的興起，是晚明佛教復興的一個典範。

他還出入北京、南京等地，住錫京城龍華寺、慈壽寺等，與達觀真可盤桓房山石經山，為南京大報恩寺請賜、齎送大藏經，也推動了北京、南京、山西、山東等地佛教的復興。尤其是他與真可在嶗山、北京的交遊，對其個人影響也很大，德清開始自覺地以復興晚明佛教為己任。

其四，德清廣泛交遊世俗，為王臣士庶所崇信，在當時社會有很大影響。特別是李太后成為其俗家弟子，反映了皇室對其佛學修為和佛教領袖地位的高度肯定，也為他贏得更大聲譽。

以往研究憨山德清者，涉及其嶗山生涯，皆言其最終寺毀人謫，是個失敗的案例。其實，嶗山佛教經由德清提倡和傳播，「法道聿興」，從幾乎的佛教荒漠變為「東海洋洋佛國」<sup>159</sup>。雖然最終德清遭謫，海印寺被毀，但薪火未絕，嶗山、即墨民眾已多信奉佛教，尊崇德清。當他被逮時，「城中士民老小傾城而出，涕泣追送，足見人心之感化也」<sup>160</sup>。在當地，德清作為傳播佛教的高僧記入史冊，流傳民間，而耿義蘭則被視為無賴，在當地府州縣山志等史志（除《嶗山太清宮志》）中根本找不到傳記。清初官員宋琬游嶗山，「觀海印寺遺址」，「山中人」仍盛稱「此憨大師之所荒也」，「道士忌而譖之於朝」<sup>161</sup>。

德清雖遭逮謫，而聲名益高。其初下獄，京城佛教界及達官士庶皆以其被誣陷，紛紛救護，「京城諸刹皆為誦經禮懺保護，衲子中有然香煉臂、水齋持咒以加護

<sup>157</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五〈與即墨父老〉，CBETA, X73, no. 1456, p. 564, a19-b7。

<sup>158</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四〈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下，萬曆二十三年乙未，CBETA, X73, no. 1456, p. 840, b1-3。

<sup>159</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CBETA, X73, no. 1456, p. 471, c16-p. 472, c14。

<sup>160</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四〈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下，萬曆二十三年乙未，CBETA, X73, no. 1456, p. 840, b1-6。

<sup>161</sup> （清）宋琬：《安雅堂文集》卷一〈送紹玄上人南歸序〉，清康熙刻本。

之者」。兵部尚書鄭洛「子在金吾，素未相識，特設燕會在朝縉紳請救，以至涕泣，訴其無妄」。其被謫，「發遣南行，朝士大夫多褻服策蹇相送以津濟者」<sup>162</sup>。赴戍途中，德清拜訪原吏科給事中鄒元標、新授行人司行人王爾康。鄒元標為當時的諫諍名臣，正直敢言，名聞天下。他們「禮」德清於江上，「請注《楞伽》」。德清抵廣州，「囚服見大將軍（疑為時任廣東總兵王化熙，引者注），將軍為釋縛，款齋食」。他寓海珠寺，「大參周海門公」即時任廣東按察僉事周汝登<sup>163</sup>，「率門生數十人過訪」，請教《易·繫辭》「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句義，德清開示，周汝登擊節稱賞，「一座嘆服」。又有諸護法者以書通「制府大司馬陳公」即時任兩廣總督陳大科，陳大科「遣郵符津濟」<sup>164</sup>。可見，廣東文武官員也沒有以德清為罪犯而輕蔑虐待，反而是主動接納，討問請教，待若上賓。這也反映出德清在當時的地位和影響。德清謫戍廣東，「起曹溪因緣」，為以後復興韶州禪宗六祖慧能祖庭寶林寺（今南華寺）打下基礎。

綜上所述，嶗山期間，憨山德清把振興晚明佛教視為己任，從一名高僧成長為佛教大師。因此，德清的嶗山生涯，無論對其個人，還是中國佛教史，都具有重要意義。儘管晚明佛教的復興有過不少挫折<sup>165</sup>，但在四大師等人帶領下，晚明佛教還是得到了全面復興，在社會中崛起，並走上通往近代佛教的道路。

## 參考文獻

### 【史料】

（明）董其昌：《容台集別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高出：《鏡山庵集》，明天啟刻本。

（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何孝榮點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明）黃宗昌纂、（清）黃坦增補：《嶗山志》，民國刻本。

（明）馬文昇：《馬端肅奏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倪岳：《青溪漫稿》，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162</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四〈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下，萬曆二十三年乙未，CBETA, X73, no. 1456, p. 840, b14-21。

<sup>163</sup> 按，『大參』為參政別稱。海門，為周汝登號。據《明神宗實錄》卷四百六十七，周汝登于萬曆三十八年二月起陞為湖廣右參政兼僉事。另據《明神宗實錄》卷三百六，萬曆二十五年正月，周汝登由南京吏部主事陞為廣東僉事。則其或在萬曆二十四年已到任廣東僉事。

<sup>164</sup>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五十四〈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下，萬曆二十四年丙申，CBETA, X73, no. 1456, p. 840, c8-p. 841, a15。

<sup>165</sup> 參閱江燦騰：《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第145—156頁；何孝榮：〈論萬曆年間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載成功大學《成大歷史學報》第四十號，2011年。

- (明)釋道開：《藏逸經書標目》，民國刻本。
- (明)釋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CBETA, X73, no. 1456。
- (明)釋福徵：《憨山大師年譜疏》，石家莊：河北虛雲印經功德藏，1994年。
- (明)釋鎮澄編纂、(民國)釋印光續纂：《清涼山志》，《中華大藏經續編（漢文部分）》本。
- (明)釋真可：《紫柏尊者全集》，CBETA, X73, no. 1452。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明)王元翰：《王諫議全集》，清嘉慶刻本。
- 《明神宗實錄》，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 (清)李煥章：《織水齋集》，清乾隆鈔本。
- (清)閔麟嗣：《黃山志》，清康熙刻本。
- (清)彭孫貽：《茗齋集》，四部叢刊續編本。
-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清)釋智旭：《靈峰宗論》，CBETA, J36, no. B348。
- (清)宋琬：《安雅堂文集》，清康熙刻本。
- 雍正《山東通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同治《即墨縣志》，清同治刊本。
- (民國)釋印光：《印光法師文鈔》，蘇州：靈岩寺藏版，1991年。
- (民國)喻謙：《新續高僧傳四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民國)周宗頤：《嶗山太清宮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年。

### 【專書】

- [英]崔瑞德、[美]牟復禮：《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楊品泉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 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第二輯，上海：知識出版社，1982年。
- 王紅蕾：《德清與晚明士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 江燦騰：《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爭辯之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
- 何孝榮：《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
- 何孝榮等：《明朝宗教》，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
- 青島市史志辦公室：《青島市志·嶗山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
- 夏清瑕：《憨山大師佛學思想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年。
- 陳玉女：《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台北：稻鄉出版社，2010年。
- 陳玉女：《明代的佛教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第十二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濮文起：《秘密教門——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溯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

釋果祥：《紫柏大師研究》，台北：東初出版社，1980年。

釋聖嚴：《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關世謙譯，台北：學生書局，1988年。

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 【論文】

王雙林：〈明末三教融合思潮之原因再剖析〉，載《理論界》2014年第2期。

何孝榮：〈明代佛教政策述論〉，載《文史》2004年第3輯。

何孝榮：〈明代宦官與佛教〉，載《南開學報》2000年第1期。

何孝榮：〈萬曆年間的國本之爭〉，載《山東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

何孝榮：〈論萬曆年間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載台灣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成大歷史學報》第四十號，2011年。

陳堅：〈明末「四大高僧」禪教關係論比較〉，載《五台山研究》1998年第4期。

陳玉女：〈明萬曆時期慈聖皇太后的崇佛〉，載台灣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二十三號，1997年。

廖肇亨：〈亂世與宗教信仰：從覺浪道盛與玉林通秀看清初佛教護國思想的兩種形態〉，載杭州文史研究會編：《首屆杭州佛教歷史文化學術論壇論文彙編》，浙江杭州，2014年11月。

劉懷榮：〈嶗山道教及其在中國道教史上的地位〉，載《東方論壇》1995年第3期。

潘桂明：〈晚明「四大高僧」的佛學思想〉，載《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4期。

戴繼誠：〈憨山大師與海印寺〉，載《五台山研究》2004年第4期。

韓秉方：〈羅教及其社會影響〉，載《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

釋見擘：〈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討〉，載《東方宗教研究》1994年10月第4期。

